

14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南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南丰文史资料专辑



旅居在外的南豐人

沈醉



碩袞名流

劉格卿輝煌

熊海文題

中共南丰县委书记熊海文题词

发挥文史资料的
特殊作用，为经济建
设服务。

朱章明

九八、四

南丰县人民政府县长朱章明题词

前 言

南丰享有“蜜桔之乡”、“健舞之乡”的美誉。千百年来，这块山川灵秀、风光旖旎的丹山碧水不但盛产闻名中外的南丰蜜桔，而且孕育出不少声名远扬的学者名流、革命志士。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江西省地方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赵醒侬，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建国四十九年来，富饶的南丰大地又养育出众多的优秀儿女，涌现出无数的俊杰英才，他们工作在海外、港台地区和全国的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智慧和专长，立德建业，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发挥着光和热，为南丰增添了光彩。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旅居在外的南丰人》作为一部文史资料集书，主要征集了现今旅居在外的南丰籍各界知名人士撰写的工作经历、成才之路、创业历程、生活体验或往事回忆等语林文萃。汇集精选的文章，是思想的火花，是智慧的精髓，是

对人生真谛的透彻感悟，是她们献身于振兴中华而辛勤耕耘的缩影，必将进一步激发南丰人民爱国爱乡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搜集、整理、编撰了明清时期南丰人口大量迁徙赣东北地区及其界邻的浙江省常山县、江山市的情况。通过实地采访、考证，掌握了丰富的史料，第一次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踪迹。

南丰县被国务院定为对外开放县。《旅居在外的南丰人》的出版，若能为海内外南丰籍有识之士来家乡投资办厂，为桔乡腾飞建营献策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若能为提高桔乡的知名度，为扩大南丰的对外交流、推动我县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们就感到十分欣慰了。

1998年12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	-----

部分文稿

我的军旅生涯.....	江含章(1)
心里话.....	刘蔼虹(5)
抱朴含真百姓情.....	陈小青(6)
我毕生在培育人民教师的园圃里耕耘.....	陈春娥(10)
我的革命历程.....	张 信(14)
我的工作经历.....	金国庆(16)
在延安.....	贾 克(21)
躬身为育才 光彩照后人	
忆邓元祥老师.....	徐亲民(36)
我的祖籍是江西南丰.....	黄 志(40)
孤 感.....	黄世贤(42)
往事回忆.....	黄国纪(45)

留学小记·····	曾道智 (49)
从南丰到济南——我的历程·····	彭加令 (57)
生平自述·····	揭秉信 (62)

人物简介

内地部分·····	(65)
海外、港台部分·····	(117)

明清时迁徙赣浙边界地区的南丰人

关于赣浙边界地区南丰移民的调查报告 ·····	曾志巩 黄永辉 (149)
----------------------------	---------------

琴城变迁·····	彭君仁 黄 翥 汤先诚 (174)
-----------	-------------------

编后记·····	(186)
----------	-------

我的军旅生涯

江含章

我191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琴台镇（今琴城镇），三岁丧父，六岁时开始在外祖父处读私塾，后在县立小学读书。十五岁时母亲病故，生活陷入贫困，即辍学随胞兄赴南昌谋生，先在“源记”纱号当学徒，后到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南昌办事处做收发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当时南昌已有一些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出售，在工作之余，我喜欢到书店购买《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以及《抗战周刊》等书刊阅读。《抗战周刊》常刊登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情况和招生广告，深受其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国家处在危难之中，为了抗日救国，我一心向往到延安抗大学习，以实现抗日救国的理想。特别是当时目睹日寇飞机在南昌狂轰滥炸，市民死伤惨重，更加激起了我对日寇野蛮无道的无比愤慨和抗日的坚强意志。同时，我感到国民党军队无能，在前线丧师失地，节节败退，要靠国民党抗日救国是没有希望的。于是，毅然下定决心，放弃原来的工作，去延安找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我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报名，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很快得到批准。回到家后，立即打

点行装，怀着满腔热血，告别兄长，告别家乡，不畏艰难困苦，千里迢迢向延安进发。

当时广大青年去延安的多半是平津沦陷区的学生和东北各地的流亡青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南方各省的青年去延安的寥寥无几。因此，这次在南昌报名去延安的只有我一人，几千里路程，其艰辛和危险可想而知。我毫不畏惧，一路节衣缩食，风餐露宿，经武汉，绕郑州，过西安，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4月4日到达延安。到延安后，我顺利跨进抗大校园，编在一大队当学员。我十分珍惜这宝贵的时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有关抗日思想，刻苦训练过硬本领，由于表现突出，同年11月在抗大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填写分配志愿时，我坚决要求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经过组织上的审查批准，我与其他十余人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当时一二〇师主力部队由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率领，在冀中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2月下旬，我们由红军老干部贺炳炎同志带队，经山西晋察冀边区去冀中（河北省中部平原）。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我在途中身患重病，不能行走，为了不影晌行程，我被留在晋察冀边区三分区后方医院治疗，在医生和当地群众的精心护理与照料下，半个月后病愈康复。为了能尽快奔赴前线，我迫切要求出院，去追赶部队。但是，去冀中平原要通过敌人的铁道封锁线，非常危险，为了不引起敌人怀疑，我换上便服，化装成当地的哑吧农民（因为我是南方人，语音不同），与地下交通员一道，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到达冀中。可是，在那动乱年代，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难以知晓，我只好暂

住在群众家里，四处打听部队的下落。过了两天，一二〇师供给部的运输队从村里路过，我抓住这一机会，搭上运输车，很快到了高阳县河西师部所在地，见到了日思夜想的部队领导和同志们。当我在师部见到贺龙师长和周士第参谋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着贺龙师长的手不知说什么好。贺龙师长听说我是从抗大毕业分配来的，笑咪咪地说：“好啊好啊，欢迎你到部队来！”第二天，周士第参谋长找我谈话，对我一个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大为赞赏，称赞有胆量，很机智，并把我留在师司令部一科（作战、训练科）当见习参谋。在一科工作的几个月中，周参谋长经常派抗大毕业生上火线参加战斗，进行锻炼。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我迅速成长起来，先后被任命为一二〇师三支队八团参谋、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八团参谋、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参谋长。1945年在绥远、包头战役中负伤，1946年伤愈后，任三五八旅副参谋长，1948年任陆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在冀中和晋西北敌后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活动，参加了百团大战、保卫延安、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边区进攻及收复爷台山的战斗，参加了绥、包战役中平绥线上的卓资山和进攻包头的战斗。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主要在西北战场参加作战，参加过青化砭、洋马河、蟠龙、沙家店、延清（延川、延长、清涧）、宜川——瓦子街、荔北（大荔县以北）、扶眉（扶风、眉县）、宝鸡等著名战役和战斗，以及解放青海省。在这些战役和战斗中，我坚决贯彻首长意图，认真组织实施，做了大量参谋指挥工作，为战役和战斗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任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秘书，1952年任西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1958年选派到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第一期）。毕业后，1960年任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为支援地方水利建设，1971年1月调任湖北省葛洲坝工程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兼参谋长，1978年任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1980年调回武汉军区任原职。为了响应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号召，于1983年正式离休。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全过程，屡立战功，被授少将军衔，副兵团级，荣获三级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各一枚。

（标题系编者所加）



心 里 话

刘霞虹

我是南丰县中和乡高峰村人。新中国成立时在县中读书，后来到省会南昌。为了人民的卫生事业，1956年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于1961年毕业，回到江西从事医疗教学工作。现受聘为江西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教授、主任医师，专门研究血液病学。

因为自己是南丰人，在日常诊疗工作中，对南丰来就诊的老乡特感亲切。日子久了，家乡人来昌找看病的也逐渐增多。属内科病的，我总是尽心尽力，认真诊断，及时治疗，不属内科病的，热切请其它科的同事专家帮忙。乡亲们省时省钱看好了病，心里格外高兴。我能为家乡父老乡亲们尽一份力，心里感到特别踏实和愉快，借《旅居在外的南丰人》一角，感谢乡亲们对我的信任和厚爱，并表示今后努力为家乡人民服务。

（标题系编者所加）

抱朴含真百姓情

陈小青

我是普通百姓家的子弟，我的思想感情深深地扎根于“百姓”中，长期以来，任时光流逝，岁月冲刷，环境变迁，这种情愫不仅没有淡漠，反而更浓烈、更醇厚。

我是在琴城老城隍庙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童年的记忆大多已变得依稀，只记得那时候，我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每当过年，别人家轰轰烈烈放爆竹的时候，我母亲总是从盐钵里抓一把粗盐，扔进火笼里，火笼里噼叭叭地炸响，算是打爆竹了。当时，我只是觉得好玩，成年以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乐观与豁达，并深深地影响了我。

少年时期，我是小伙伴中的砍柴能手。每当暑假，我们便相约上山砍柴，我每天都能砍下两担来，是小伙伴中砍得最多的一个，一个暑假下来，够全家半年烧的。那时候，我家的生活依旧艰难，每天砍柴带的午饭，就是在饭上撒几粒盐而已，哪里有什么菜，但我从不觉得苦。学校里当时搞勤工俭学，老师带领同学们开荒种菜，我的菜是全班种的最好的，老师总是表扬我，同学们也非常羡慕。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还经常为附近的农民放牛，赚几个零钱，买点学习用品。这个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的自豪与欣慰。

儿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培育了我对父老乡亲的朴素情感，他们的勤劳、善良深深地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艰苦的生活也强健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增强了我的自强、自立意识和能力，这是我终身都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16岁那年，父亲病逝，我中止学业，参加了工作。这些年来，我先后担任共青团南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抚州市常务副市长，崇仁县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兼东乡县委、临川市委书记，工作岗位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对父老乡亲的感情丝毫也没有改变，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我都把为群众谋利益，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作为自己工作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县市主要领导岗位上，我致力于带领当地群众努力发展经济，促进了当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重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管理，使当地的城市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力发展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维护了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我常想，自己能走上今天的领导岗位，完全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历史的机遇。在他乡工作这么多年，我十分怀念我已故去的双亲，时刻也没有忘怀故乡可敬可爱的父老。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郑板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多年来，我把群众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关心群众，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满腔热情地为他们解决一些实

际困难。至今，已记不清接待过多少素不相识的群众来访，也数不清在多少素未谋面的群众来信上作过明确的批示，以致于若干年后，当有人走到我面前说“谢谢陈书记，多少年前是您帮我解决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有的事还能仿佛记得，有的竟毫无印象。我从不希望因此而得到人们的回报，但当小女放学回来告诉我“今天上学自行车扎了胎，路边修车的师傅主动帮我补好，却不收我的钱，只说你爸爸我认识，是个好人。”这个时候，我胸中总会涌起阵阵暖流——多么好的群众啊！我这个人非常重感情，也能随和真诚地对待周围的普通百姓。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临川罗针镇许渡搞社教，当地淳朴的民风，房东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返临川工作，以市委书记的身份重访许渡，寻访当年旧迹、故人的时候，双方依然感到那么亲切。当年的老生产队干部现在都已是古稀老人了，有时还会到我办公室来坐坐，有什么难事都乐意找我。家乡人不管是各级干部还是农民朋友，有事找到我，我总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帮助解决。

在别人看来，我这个“官”当得也不算小了，但我却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常想，当官只是一阵子，自己来自老百姓，还要回到老百姓。人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还要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自己今天在这个位置上，要说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就是能实实在在为老百姓、为社会多做点事，至于生活上我还是一个普通百姓。

我不喜欢门前车水马龙，在家里一般不接待来人来客。

白天忙于工作，傍晚有时间陪家人到外面散散步，晚上在家里看看电视。节假日，偶尔还带上家人，到公园里游玩游玩，中午在路边小店炒几个小菜，一家人坐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每当在北京工作、读书的两个女儿回来，我还喜欢下厨炒上几个拿手菜，让孩子们吃上几餐久违的南丰菜，“纯正”的家乡美味。

每年正月，我总要携家人回到故乡，与那里的亲人聚一聚，吃顿团圆饭，给故乡的父老乡亲们拜个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节，没有特殊任务，我一定要抽空回乡扫墓，以寄托对已故亲人的无限缅怀与哀思。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党和人民养育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桔乡人民的儿子；我将永远热爱养育我的父老乡亲；我将永远保持一个普通百姓的本色。

1998年6月20日

我毕生在培育人民教师的园圃里耕耘

陈春娥

我生在琴城，长在琴城，是在南丰的师长们培育下知书识礼走上人生旅程的。所以，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丰人。

我的启蒙学校是新民小学。这是所教会学校，解放初被撤并，我便转入琴城高小。小学毕业，考入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南丰初级中学（今南丰县一中）。五十年代初，南丰全县还没有高中，我们初中毕业后的升学考试是在南城举行的。考试完毕的当天，1953年的一个夏夜，我们这批从未离开过南丰家门的少年学子便背着简单的行囊，急匆匆地步行返归了。那时从南城到南丰只有稀稀的几班过路客车，乘车难，又费钱，有几位胆大的男同学建议来一次夜行军。提议获得不少人的响应，我和鲁启慧、方素芬几个女同学也欣然同意。于是，一支十几人的小小队伍便在淡淡的月光下，沿着盱江旁弯曲起伏的公路，勇敢而欢快地朝南迈着青春的步伐。这是我出生以来的第一次长途跋涉，80多华里的路程，居然奇迹般地走了过来。这奇迹，来自友爱的集体，来自信心与毅力，当然也带着几分的稚气。

1953年的9月，十六岁的我离开了家乡，来到临川师范学校就读。从此，我就和教育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二年